



学者、思想家余世存的新书《家世》出版的时候，“家风”几乎成为一个全民话题。在这本书中，余世存逐一点评中国近现代史上显赫一时的名门望族的家风、家教：林同济家致力于培养专门人才，适应中国的现代化；宋耀如家要出伟大人才；卢作孚家则是让孩子不当败家子……

随着历史的远去，这些名门望族留给后人的更多是关于财富与权力的遐想。近日，余世存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，他更看重这些世家对宗亲伦理的态度，以及对因果观念、礼义廉耻等传统信条的尊奉。

家族兴衰里的传统

——名门世家的家风与家教

□本报记者 吉祥

从世家归为平民是最安全的

四五年前，余世存去云南大理短期逗留，偶遇一位同龄人，看上去与普通的海外华人无异：阳光、敦实、健康、沉静。吃饭时，余世存才知道他是孙科的外孙王耀祖，在座的人也无不感到惊讶。经过外人介绍，余世存了解到这位孙中山先生的后人有三个硕士文凭，正在读中医博士。回北京后，余世存跟朋友说遇到了孙中山的后人，当对方得知王耀祖的现状后叹了一口气：“怎么都变成了知识分子啊？”余世存略感诧异，毕

竟他更多看到的是王耀祖的个人成就，而他的朋友的视角却是孙先生后人跟国家社会的关系。

这是余世存的《家世》希望传递的信息，即便他写的家世故事绝大多数是传统的世家豪门，但财富与权力并不是他的窥视对象，他更愿意观照这些世家如何在现代社会转型，又是如何在家风、家道的传承中坚守传统文化的信条。比如，他在研究蒋氏家族的历史时发现，尽管因蒋介石、蒋经国曾处在权力的顶端，

蒋家灿烂至极，一时风光无限，但蒋家到了第三代却遭遇男丁普遍的过早夭折，此后的第四代、第五代主动归入平淡，退出政治，投身商界、文艺界、教育界，安心做平民。“蒋家到现代社会后的转型，肯定会遭遇多方面的冲突，但换一个角度看，可能做一个普通公民是最安全也是最不累的。”余世存对记者说，在蒋家人的经历中依然遵循着祖先传下来的家训“孝悌忠信，礼义廉耻”。

家不再是中国人唯一的皈依

特殊的家庭身世赋予了这些世家后人与生俱来的家国情怀，宋氏家族尤为典型。宋耀如虽然早年贫困，但发迹后特别重视子女教育，他教育子女要“做伟大人才”，这与他的梦想密切相关。宋耀如曾说：“只要一万个孩子中有一个成为超人式的伟大人才，不得救？”也难怪日后宋子文一直记得父亲生前的叮嘱：做不成人，不能回文昌认祖宗，见父老。

在《家世》一书的写作过程中，余世存感受很深的是现代人与这些名门的隔膜，这不仅与身份的差异有关，也受认识的局限。他写民国著名实业家卢作孚的时候，和不少企业家有过交流，问他

和民国的实业家有什么区别，对方说，他们不如我们会生活。“完全是隔膜，他与他们的前辈是有隔膜的，他不知道当年那些上海滩的老板比现在的土豪，既会生活，也更有文化。”

更大的隔膜在于，在现代社会，家世的概念已经变化很多，这不仅仅体现在家庭结构从四世同堂过渡到二世或一世家庭，更在于家世从宗族家庭问题，演变为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。余世存以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“二代现象”举例说，尽管“成分论”早已成为历史，但流行于社会的“我爸是李刚”等现象，既说明这种宗亲文化依然根深蒂固，也说明这一概念在维系家庭的同时，

其负面意义同样不容忽视，“今天，它同样维系了人间的善，也放任了人心的罪恶”。

在书的序言里，余世存讲了一个进京与孩子同住的老人的故事。一位从农村进入城市“享福”的老人，却因忍受不了城市生活与乡村社会巨大的语言、文化等差异而轻生。在更大的层面上，急剧流动的社会也在挑战家在每个人心中的地位。这促使余世存反思“家”这个概念的定义，“以前，家几乎是一个人唯一的皈依，但现在中国人的流动性很大”。余世存说，从长久看，他虽然坚信未来家族的传统不会消亡，但家已不再是一个人安身立命唯一的认同。



余世存近照

对话余世存—— 家风是什么，取决于你自己

齐鲁晚报：您在写这本书时，把如此多的豪门世家组合起来，希望传递一个什么信息？

余世存：我希望传递三层信息。首先是传统中国家族的宗亲伦理，对因果观念、礼义廉耻的尊奉。第二是传统家族如何向现代社会转化。第三是普通家族如何进入世家行列。毕竟名门望族传下来的已经很少了，现在中国家庭，都是普普通通的二代同堂，顶多三代同堂，想借这本书证明一下，普通人家能不能成为社会的栋梁，像荣氏家族说的“一人有余顾一家，一家有余顾一族，一族有余顾一村”。

齐鲁晚报：您的书中提到的多是名门望族，类似蒋家、宋家在当时均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资源，很多普通人可能会认为，他们的家教、家风与一般人相比必然会有所不同，借鉴意义不大。

余世存：像宋耀如和卢作孚都是穷苦出身，所以我们不要看民国那些人有资源，他们很多人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打拼起

来的。我希望读者还是要跟自己参照，比如对因果的态度、对传统的态度，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公认的东西，如果能在自己家身体力行更好。我们现在经常讲，中国的现代化是被推着走的，它虽然有其自身的秩序，但缺乏传统家族的伦理秩序。我希望读者能从这些家族中有所借鉴。

齐鲁晚报：名门望族到了现代社会面临向平民化转型的时候，有些可能是政治原因，有没有主动转型的？转型给他们带来的冲突是否剧烈？

余世存：我只能猜测，但我认为蒋家是主动的，蒋家在第三代男丁几乎都夭折的情况下，第四代、第五代逐步退出政治舞台。我觉得在现代社会立足，做一个公民，做一个普通人，可能更安全，也不累。

齐鲁晚报：一些大的家族特别重视家教家风的传承，子女的职业选择也更加多样化一些，和现

在我们常见的“二代现象”差别很大。您如何看待这种差别？

余世存：我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过，现在的有钱人教育子女，不该再让他们学有用的东西，而是去学点无用的东西。在这些老板眼里什么是无用的？读书无用。那就让他们去读书。我们现在有个毛病，教授想办法让孩子继续干教授，演员让孩子继续当演员，医生想办法让自己的孩子继续干医生，都搞这种职业世袭、行业世袭。把国家利益部门化，部门利益私人化，私人利益世袭化。其实在外国，不是这样的。

齐鲁晚报：现在很多人在谈我们为什么“富而不贵”，您如何看待？

余世存：因为现在在富人身上看不到文化的影子，看不出文化的积淀。

齐鲁晚报：但像宋耀如、卢作孚，他们自己虽没有多少文化，但对子女的教育特别强调文

《傅雷家书》
傅敏 编著
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

《王匡维家事》
王东明 著
安徽人民出版社



《我的家庭回忆录》
钱理群 著
漓江出版社



【相关阅读】

化的作用。

余世存：这其实是传统中国人或者是有中国文化积淀的人的一种态度。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，不是官本位，财富本位，而是对文化本身的尊崇，这就是“文化中国”的力量。不管你在这个世界上多有地位，多有钱，最终要在文化里一争高下。过去有一句话，一代讲吃，二代讲穿，到第五代才能讲出文章来。其实我们的文化人也面临这个麻烦，但我们学到了文化知识，但我们最基本的文化积淀是不足的，我们太急功近利地去追求眼前的东西。

齐鲁晚报：现代社会维持传统家庭关系的纽带似乎不是很牢靠，传统的家庭关系是否也在遭遇挑战？

余世存：在传统社会，家几乎是唯一的皈依，叶落归根就是这个意思，所以大家不愿意漂泊。但现在中国是个移民社会，流动性非常大，何况我们又被纳入了全球化的体系，所以传统的

宗亲伦理已经不是中国人唯一的皈依地与情感的归属。现在中国人的宗亲伦理意识在扩大，扩大到我们对朋友、对陌生人的感情里了。传统中国人的交往不超过过亲友，但我们现在几乎只在节日时和亲人有联系，我们日常交流就是朋友圈，比如微信的朋友圈。朋友填补了传统宗亲淡化的空白，未来家族的传统不一定会消亡，但不会是一个人安身立命唯一的认同。

齐鲁晚报：现在很多人谈家风、家规时，常常给人一种感觉，就是特别强调规则或是“父权”的意志，有一种束缚感。

余世存：很多人认为家风家教是一个客观的东西，是固定的，有绝对价值的，不容挑战的权威。我的感受是，传统中国家庭要向现代社会转化，家风应该是多方的共同产品，是几代人互动的产品，不能说一个人是家风的产物。这就是说：传统是什么，取决于你自己；家风是什么，取决于你自己。